

丹尼洛·契斯作品

I

栗树街的回忆

给孩子和敏感的人们

【南斯拉夫】丹尼洛·契斯 著

张明玲 译



EARLY SORROWS

Danilo Kiš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丹尼洛·契斯作品 I

栗树街的回忆

给孩子和敏感的人们

EARLY SORROWS

【南斯拉夫】丹尼洛·契斯 著

Danilo Kiš

张明玲 译



中信出版社 · CHINACITICPRESS 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栗树街的回忆 / (南) 契斯著; 张明玲译. —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4.8

书名原文: RANI JADI (EARLY SORROWS)

ISBN 978-7-5086-4350-2

I. ①栗… II. ①契… ②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南斯拉夫—现代 IV. ①I54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2851 号

RANI JADI (EARLY SORROWS) by DANILO KIŠ

World Copyright © DANILO KIŠ 1965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4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.

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版权限在中国地区发行销售

栗树街的回忆

著 者: [南斯拉夫] 丹尼洛·契斯

译 者: 张明玲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: 7 字 数: 66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350-2/I·468

定 价: 30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导读

抵抗虚无

景凯旋

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·契斯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人物，身为犹太人，他的一生经历了纳粹占领、斯大林式统治以及南斯拉夫解体前的民族冲突，始终都感觉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。由于英年早逝，且喜欢阅读甚于写作，他不是一位多产作家，其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《花园，灰烬》、《沙漏》，三部短篇小说集《栗树街的回忆》、《达维多维奇之墓》、《死亡百科全书》以及三部散文集。即使如此，这些作品已足以奠定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了。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可以看作是一个系列，分别写了两种极权制度下人的毁灭和原因。其中《达维多

维奇之墓》一书，更是被视作继奥威尔《1984》、库斯勒《正午的黑暗》之后描写极权的一部经典作品。

《达维多维奇之墓》取自短篇集中一篇小说的名字，最初的集子则以其中另一篇小说《红木柄小刀》为书名。这部涉及第三国际恐怖历史的书出版于1976年，立即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，但在契斯家乡，小说的内容却招致斯大林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攻击。由于书中人物大多有犹太血统，对此书的毁谤因而充满了反犹意味。这些人避而不谈“大清洗”历史，而是指控契斯剽窃索尔仁尼琴、乔伊斯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，宣称这是一个丑闻。为了替自己申辩，契斯撰写了随笔集《解剖课》，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人文观念和文学渊源，同时也使读者得以了解他的生平经历。

契斯1935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小城苏博蒂察，靠近匈牙利边境。父亲是匈牙利籍犹太人，在铁道

部门工作，母亲是黑山寨族人，信奉东正教。这个出身赋予他一种混合的身份和文化。像所有生活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一样，他父亲的宗教感已很淡薄。他从小生活在苏博蒂察南边的诺维萨德，那是个横跨多瑙河的城市，塞尔维亚、匈牙利和德国人居住在不同社区。1939年，匈牙利颁行反犹法律，为了避祸，父母让他受了东正教洗礼。1941年诺维萨德被匈牙利吞并后，来自周围的敌意迫使他父亲不断搬家。由于一直受到周围孩子的欺负，童年的契斯始终处在恐惧之中，感到自己无处可去。

1942年，诺维萨德发生了屠杀犹太人事件，受害者尸体被扔进冰冷的多瑙河。契斯全家逃到父亲的匈牙利家乡，但在那里也不安全，经常有士兵和警察闯进家里检查证件，翻箱倒柜。父亲给了他和姐姐一本匈牙利杂志，并告诉他们要高高举起来，让别人看清楚杂志的名字。契斯意识到自己仍不属于这儿，乡村天主教堂的钟声让他感到神罚的

恐惧，他在一户富裕农民家干活，在学校学习天主教的教义问答，但他不能进教堂，只能晚上在家里接受母亲的东正教教育，学习用斯拉夫语朗诵主祷文。1944年，他父亲及其亲戚被送往奥斯维辛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“二战”结束后，他搬迁到母亲的家乡采蒂涅，进入当地一家音乐学校学小提琴。与此同时，他一边写诗，一边翻译匈牙利、俄罗斯和法国的诗歌。毕业后，他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，在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学习，并获得首个比较文学文凭。那以后，他一直居住在贝尔格莱德，工作、成家和创作。他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962年，最后十年他移居法国，此间只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《死亡百科全书》，却接受了大量采访，写了不少随笔，直率地批评国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。此时，种族、宗教再度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报纸专栏上充满仇恨的主题，他似乎已经从中预感到，在他的故土，往日的

情景将会重现。

童年对契斯的文学成长有着很大影响，他从乡民那里知道了各种匈牙利神话和格言，从母亲那里知道了塞尔维亚的许多抒情诗和史诗，还有故事和神话，因此很早就意识到所有民族神话的相对性。在契斯幼小的心灵里，这种民族意识是由世代相传的传说统治的。从这些神话和传说中，他读出的是杀戮和死亡。林中仙子与冬天发黑的窗户、雪地里的枪声融合在一起，成为缠绕他的噩梦。这种梦境延续到他的文学创作中，他把它归于母亲的遗传，母亲给他讲故事时，总是喜欢将事实与传说混淆起来。

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更是出于一种创作自觉。现代作家越来越明白，小说不可能反映全部真实，它只是表现作家眼中的世界，因而杰出的作家会竭力寻求属于自己的一种叙事方式。这是他的世界观，

他的认识论。在这方面，契斯是突出的。早期的《栗树街的回忆》已经显出他的独特风格。全书不断转换叙事角度，跳动、省略、断断续续的片段，构成每一个章节。没有完整的情节线，所有的心理描写都是想象的內化。我们只知道，这个家庭住在栗树街，那里有着优美的乡间景致，儿童山姆每天的生活虽然艰辛，却充满童趣，放牛、游戏、尿床、初吻、马戏团、捡蘑菇，各种片段式的印象构成了一个孩子的现实世界。

接下来，周围发生了屠杀、抢劫、军队路过，这些事件都写得含混、跳跃，只有繁复的印象透出儿童内心的恐惧。酒鬼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了。父亲怎么被带走的，又是怎么死的，读者像山姆一样不清楚。只是从幸存的姑妈那里，山姆才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并从父亲留下的家族档案中窥知了部分事实。此前，他的初恋遭到父亲的教训后，他睁开眼睛看见父亲“高大的身躯戴着一顶硬边黑帽，手上拿

着棍子，在手推车后面拖着脚步往紫色的地平线走去”，而现在诗意的幻觉消失了，父亲一点也不像一个传说中的英雄，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不朽的遗言：

丽贝卡姑妈恶意的眼神暗示着令人痛苦、可悲的事实：与贫乏、虚弱的灵魂为伍，在惊慌失措的妇女、担惊受怕的孩童中间，与他们艰难地同行，与他们并肩，高高的、驼着背，没戴他的眼镜，没拿他的手杖——这些都被他们夺走了——恍恍惚惚地、在受难者的行列中曳足而行……他们用棍棒和来复枪的枪托殴打他；他呻吟着倒下；女人们为他鼓劲，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然而他——天哪！——哭得像一个婴儿，他那叛变了肠胃散发出恶臭。

家庭的巨大变故叙述得如此平淡，甚至有点戏讽的味道。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心里，还无法理解屠杀犹太人这样的人类事件，他试图逃离难以理解的

现实，让自己的想象跟生活保持距离，但这只能使叙事显得更加残酷。如果说，小说是作家赋予生活一种形态，那么契斯的世界就是一个超现实的噩梦。这种不连贯的叙事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，简短的片段组成繁复的印象，使得读者很难获得综合的认识，由此表现出世界的不可解释性。在创作上，的确可以看出乔伊斯、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、舒尔茨甚至卡夫卡的影响，但对真实资料的使用却已经体现了契斯的特色。在此后的《达维多维奇之墓》中，这种虚实结合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加强，并形成一种独特而混杂的风格。

《达维多维奇之墓》由七个短篇故事组成，叙写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个职业革命者的命运。书中发生的事件与南斯拉夫无关，角色都是俄罗斯人、乌克兰人、爱尔兰人、匈牙利人、德国人，大多具有犹太血统。正如人们所知，犹太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曾起过重要作用。这些革命者四海为家，在

欧洲各地组织革命，对这个世界充满狂热的仇恨，发誓要彻底改变它。需要提及的是，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，有些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。用契斯的话说，这些故事都根据书籍和资料中完全真实的事情写就，主要来源于卡尔罗·希塔伊奈尔的回忆录《在西伯利亚的七千个日子》。希塔伊奈尔是南斯拉夫人，为第三国际工作，“大清洗”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，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。

契斯的个人经历使他十分钟情于残酷的题材，他沉溺于有关“大清洗”的各种记载。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，契斯已不再信任作家的虚构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，那就是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重建故事。在他看来，“二十世纪文学经历了一场巨变：文学不再是罗曼蒂克的，它不能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罗曼蒂克。对浪漫主义者来说，幻想是文学的主导因素。在经历这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切之后，显而易见，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

其全部意义。现代历史创造了这样真实的现实：今日的作家别无选择，只能赋予它艺术形态，在必需的时候‘创造’它：就是说，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，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。”在此书里，契斯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学家，在档案、回忆录、传记和新闻报道中爬梳材料，试图将散见的事迹连缀起来，呈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。资料里所缺乏的具体情节，以及环境、言行和心理等细节，就用想象来补充。

对契斯来说，史实的真实才是文学的灵魂，但他并不排除必要的想象。他把这称为“想象的现实主义”。在写作此书时，他采访过希塔伊奈尔，后者指出他的几处描写失实，比如黄昏时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在克里姆林宫墙外散步，因为会立刻遭到逮捕，但契斯并没有删除这个细节。诗人布罗茨基曾引用此书一篇故事中的一段描写，来说明契斯的写作手法：

世纪之交中欧城市普遍萧条的情形显而易见：灰色的平房，阳光缓缓照进后院，分割出两块截然不同的区域——一边是诱人的明亮，一边是如同黑夜、潮湿发霉的阴影；成排的黑刺槐分泌出树汁，像是浓稠的咳嗽糖浆或药片，童年患病时的麝香味；冰冷的巴洛克药房，哥特式的白瓷容器闪着微光；昏暗的中学校园铺砌了院子（斑驳的绿色长椅，形似绞台的破秋千，粉刷过的木屋）；市内的建筑都漆成了玛丽亚·特蕾西亚黄，那是黄昏时吉卜赛乐队在大饭店露天餐厅演唱的歌谣里，枯叶与秋日玫瑰的颜色。

就像许多省城里的孩子一样，药剂师的儿子卡尔·陶贝也梦想着，有那么一个快乐的日子，他将在离开之前鸟瞰这个城市，隔着厚厚的眼镜片看它最后一眼，就

像透过放大镜看学校里那干透了的、滑稽的黄色蝴蝶标本，既难过又厌恶。

1920 年秋，在布达佩斯火车东站，他登上前往维也纳的快车的头等车厢。火车驶离的那一刻，年轻的卡尔·陶贝再次向父亲挥手道别（父亲挥动着丝巾，像一个黑点逐渐远去、消失），便很快带着皮箱走进三等车厢，和工人们坐在一起。

布罗茨基评论道，药剂师的儿子选择和工人坐在一起，象征着他未来的革命道路，这是一种常见的细节描写，而父亲“像一个黑点逐渐远去、消失”的观察则完全是诗，“丹尼洛·契斯明显诗化的散文带着对想象和细节的强调，以及反讽的超然，通过提醒读者注意其本身的智性，将他那恐怖的主题置于最恰当的视角。因此，读者对被描述的现象的道德评价不再仅仅是心神不安的感伤，而是由他深深刺痛人类的最高智力所产生的评判。这不是思想被

感觉，而是感觉被思考。”契斯的作品终究不是历史著作，而是在历史的框架结构下，由想象和细节构成的文学世界。

作为一个诗人，布罗茨基特别赞赏契斯的文字，称书中的许多篇章、段落可以当作诗歌来阅读。不过，与《栗树街的回忆》相比，此书的描写更加质朴平实，情节也更加完整，但叙事仍然是片段的拼贴，那种蒙太奇式的画面，总能激起读者的强烈感觉。这些第三国际的革命者，无论是知识分子、商人的儿子，还是平民子弟，他们的一生都大致相似，有着钢铁般的意志，充满传奇的色彩：暗杀、暴动、参战、逃亡、流放、被捕、审讯。他们掀起的革命、内战、集体化在半个世纪里像风暴扫过俄国乃至欧洲大地，更像是用鞭子抽打着人民的脸庞（书中的一个比喻）。然而，迫害者并不比受害者活得更长，最终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自己阵营的清洗，在受尽折磨后步向死亡。书中一个人物在青年时写的诗句

得到了应验：母猪吞吃了自己的猪崽。

书中最长的故事是有关达维多维奇的经历，他年轻时走过私，当过学徒、码头工人和司炉工，组织过罢工、街头示威、暗杀，然后是苦役和逃亡。

“十月革命”爆发后，他又作为苏维埃高级领导人，指挥征粮，与白军作战。西方一篇评论这样描述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形象：“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——没有道德观念，愤世嫉俗，对理念、书籍、音乐还有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狂热。要我说，他看起来像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。”革命者的目标就是打碎旧世界，解放全人类，这自然也包括颠覆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。无论对情人还是民众，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同类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，世界围绕他们旋转，而他们则冷冷地看着世界。

想象他们成为阶下囚后的心理活动是很有意思的，在契斯笔下，达维多维奇被捕后面临的问题：

“为了那难能可贵、代价高昂的认知，接受这有限